



汾陽善昭對臨濟家風的振興

陽 力

中國禪宗自菩提達磨以來，依次傳承，自慧可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而慧能，這已是公認的史實。但慧能以後法傳何人，則又是衆說紛紜的事，有說七祖是荷澤神會，因他是欽定的，更因他北上討伐，打倒北宗，高振曹溪一脈。又有的說是南嶽懷讓，因他得慧能親傳，復有裴相親作最勝輪塔碑文爲憑，庶幾可信，毋庸置疑。又有說是法如，因他親承曹溪法脈，依止慧能三十餘年未離左右，後弘化一方，朝野歸附。……但據《佛祖統紀》所載，在五祖門下的慧能，就當時來說，似乎並無多大影響，僅作爲「一方人物」而已。相反的對神秀評價卻頗高，《楞伽人法志》記弘忍的話：「我與神秀論《楞伽經》，玄理通快，必多利益。」其碑文亦云：「學人多矣，唯秀與安」秀指神秀，安指老

安。所以在《楞伽師資記》的傳承裏，從達磨一直到神秀爲第六代，普寂爲七祖，依次傳承。而在法如一派其傳承又有所不同，各自都以達磨爲祖來標榜自己的正宗，所以到底不那麼可信。但由於各派的大肆渲染，均已成爲史實，近人又能奈何，總不能推翻歷史，來一次禪門祖師大論戰吧，這似乎不是學術界所提倡的，今只能略去不談。

曹溪禪之所以能成功，奠定中國禪宗發展的道路。其最主要一點是從官僚化走向了民衆化，既順應了封建士大夫喜清淡玄學的口味，又應化了下層民衆「不求一句，即心即佛」的簡易宗教思想。所以能迅速得以發展壯大。但以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，曹溪禪的發展仍只局限於嶺南一帶，遠沒有神秀禪「兩京法主、三

帝國師，王臣公庶望塵拜伏，日逾萬計」的場面興盛。這一點是有史可查的，日後曹溪禪逐步走向興旺，由一隅而遍全國，應得力於其弟子的大力弘化。主要體現在南嶽懷讓、青原行思及法如、神會的鼓吹和倡導。神會北伐，推倒北宗，其功勞在於滑臺無遮大會上「爲禪宗辨是非，爲禪門立宗旨」。將北宗從統治的地位上推了下來，建立了以曹溪思想爲中心的正宗合法體系，並得到了官方的擁護與支持，這是中國禪宗史上的一大轉折點，但其以「無念」立宗的法門並未得到持久的傳承，真正使中國禪宗走向頂峰的還是青原行思、南嶽懷讓及其法嗣。

南嶽一系傳馬祖後得到發揚光大，與青原系的石頭並駕齊驅，左右中國禪宗。唐國子博士劉軻云：「江西主大寂，湖南主石頭，往來憧憧，不見二大士，爲無知矣。」馬祖寂後，傳法百丈，製定了禪門規式，奠定了農禪並重之風，建立了禪宗樸素模式，這種模式一直流傳下來，直到後世，影響了整個中國禪宗。其法脈經黃檗、臨濟後，在馬祖禪的基礎上融進了各家學說，建立了一種超越豪邁的、充滿自由思想的禪門體系，兼以棒喝交接，呵佛罵祖，機鋒峻烈，氣勢奪人而立宗派，後世稱爲臨濟宗。

臨濟的禪法從總的來說雖來於黃檗，但與他複雜的師承和坎坷的經歷亦大有關係，正是他兼容並蓄的學風才使他的模式禪更具特色和時代精神。《慧明禪師語錄》記他自述：「山僧佛法，的相承，從麻谷和尚、丹霞和尚、道一和尚、廬山拽石頭和尚……」等等，燈錄記載是「首參黃檗，次謁大愚」所以他所接受的並不是某個禪師的衣著言詞，而是整個禪的「玄旨」，這與他日後創立的「三玄三要」有相當大的關聯。雖然在他之前，馬祖以踢、打、喝，黃檗以罵、拂、捧而著稱，但真正把這些手段全部貫穿於日常禪行之中，義玄可算是第一人。因他在黃檗處三

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，最後在大愚處方言下大悟，所以他對於「打」是有切身體會的。對於這一接機手法，在日後的傳承中曾被廣泛利用，并風靡一時，惜傳到後來，日漸式微，未有超出義玄者。到首山省念時，已只是流傳於形式了。所以風穴延昭會云：「不幸臨濟之道，至吾將墜於地矣！」仰山慧寂亦云：「臨濟一宗，至風而止」（見禪林僧寶傳）風指風穴延昭。燈錄記，首山省念極重戒律，常密誦法華經，有念法華之稱，風穴曾批評他「唯恐耽著此經，不能放下。」雖然他日後住首山，在接引學人方面亦採用一些臨濟的手段，但到底不那麼徹底。所以風穴擔心「宗旨墜滅」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後來他在風穴門下大悟，並承接臨濟宗旨，從法華一轉而入金剛，但在理論和實踐上並無多大建樹，亦無多大影響，真正改變臨濟宗這種日漸式微形式的是其弟子汾陽善昭，他倡導的文字玄談及頌古拈古，將禪境寓於韻文之中，十分的風趣別雅，不僅興建了一種新家風，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體裁，受到了文人及士大夫的愛戴和擁護。臨濟宗風由此一改沉冗，迅速興旺發達起來，並推動了整個禪宗的發展。

善昭(947—1024)俗姓余，山西太原人，父母早逝，十四歲出家，受具足戒後一直過着「杖策游方」的生活，廣泛接納融洽諸家學說，先後歷參各宗尊宿七十一人，「所至少留，隨意叩發，皆妙得其家風。」並在遊學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，聲譽四播，最後在省山處得大悟。悟後仍然「南遊湘衡，北歷襄汾」，繼續過着遊方參道，飄泊無定的生活，前後達三十餘年之久，直到淳化四年(993)首山省念圓寂，在僧俗衆人的堅請下，方駐錫汾州。燈錄記載：自首山歿，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，師閉關高枕，聽排闥而入，讓之曰：「佛法大事，靖退小節，風穴懼應識，憂宗旨墜滅，幸而有先師，先師已棄世，汝有能力荷擔如來大法者，今何時而欲安眠哉？」師矍起，握聰手曰：

「非公不聞此語，趣辦嚴，吾行矣！」於是應邀而住。

善昭非常重視遊方參學，可能與臨濟義玄的家風及他年輕時的遊歷有關。因臨濟義玄的時代，正是晚唐五代時期，由於社會的動蕩，流僧流民大量增加，佛教內部的鬥爭亦變得非常激烈。禪宗經歷由不立文字、農禪並重、寓禪於作而一變成爲行腳天下、四方參學，從而產生了「參禪」和「應機」，而寺廟相對來說，又必須對來者的動機、身份、水平方面進行考察，而這些相互之間的對話，便變成了「機辨」和「互呈機鋒」。往來之間的唱酬便變得非常的流行起來。

臨濟對這種賓主之間的唱酬非常重視，他總結了不少這些應對的方法，揉入自己的見地設立了峻烈的禪風。正如他所言：「主客相見，便有言論往來，或應物現形、或全體爲用、或把機權喜怒、或現半身、或乘師子、或乘象王。」這種以不同的方式對不同情況的處理，也是義玄的基本禪風之一。在臨濟宗裏，一直受到重視和發揚光大。所以善昭鼓勵弟子們外出參學廣泛接納諸家學說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以他本人來說亦是如此，特別是在開導學人方面，更是多方並施，《林間錄》記：「汾州無德禪師，示徒多談五位、臨齊三玄，並作《廣智頌》，明十五家家風。」其目的是兼容並蓄，磨煉機鋒，提高和掌握運用機鋒的能力。故臨濟能代代相傳，蓬勃發展，歷時至今，與祖師們鼓勵的參禪風是分不開的。這不僅可說是臨濟宗的風格，也是善昭禪風的基本特色之一。

善昭禪風還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即在於倡導公案，公案一詞本出於世間官吏用於判決是非的案牘，禪門中用來指前代禪師的言行範例，雖然在禪門中早有參究公案的說法，但真正將它納入禪行中運用的卻始於黃檗，最終將它落實到頭等位置，而將這一方法進一步深化闡明的卻是善昭。所以說參究公案之風是「唱於唐

而盛於宋」。蓋因中國禪學雖在達磨之前即有萌芽，但到底是一種文字教法悟入禪。直到達磨來後，以不立文字，直下悟入而開另一種禪風，是爲實證悟入禪。這種冷峻的禪風經數代相傳，到了曹溪乾脆摒棄文字，又變成一種當下就是、即心是佛的中國式禪學。不僅更乾脆更了當、更直接，而且也更符合中國的民情與思想，適應中下層民衆的簡易宗教意識，開創了一代宗風。在以後的傳承中，由於各自根器的不同，在接引學人方面，各人又融進了自己的見解，演成各家宗風。禪師們在言行上的隨機利物，學者們亦跟着隨言悟解，各人的理解能力不同，受益便有大小之分，文字語言禪就變成了一種媒介，引導學人從「示」到「悟」的階梯，所以禪師們便時常要學人參個公案，從古人語錄上得個入處。這是黃檗禪師及黃檗以後的禪師們最常用的一種手法，如黃檗常教人「若是個丈夫漢，看個公案，僧問趙州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無！但去二六時中看個無字，晝參夜參，行住坐臥，著衣喫飯處，屙屎放尿處，心心相顧，猛著精彩，守個無字，日久月深，打成一片，忽然心花頓發，悟佛祖之機，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。」這種藉古人語錄來求悟解禪之真諦的主張，與義學沙門從佛經中體悟佛理的手法極爲相似，其方式方法亦被禪師們所接受和認可。但善昭卻認爲這種參究公案的「參玄」與義學沙門有着根本的不同，參玄是在藉古人語錄的基礎上進行參究，其目的是在於「頓見」「直入」「打脫桶底似的」，所以他說是「頓開一性之門，直出萬機之路」，「了萬法於一言，載衆流於四海」，是一種活生生的實證悟入方法。而義學則有所不同，他是將經典擺在重要位置的，言教是第一位，必須憑着文字去悟理，是一種理性的悟入方式，二者之間有着根本的區別。所以參玄必須要明心，「心明則言垂展示」，「智達則語必投機」。而要達到這種境界，在學人方面就離不開善知識的言

教，故在開示學者時曾反覆地強調「三玄三要」，即是要使學人通過「三玄三要」來體取古人的意旨，悟解其中蘊藏的內涵而見道，藉此一點來啓示學人，就是要「承言而會意」「得意而忘言」，從而達到「會通」。故他常說：「一句語須具三玄門，一玄門須具三要，而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？快會取好，各自思量，還得穩當也未？」又說，「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，每一玄門須具三要，有照有用，或先照後用，或先用後照，或照用同時，或照用不同時。先照後用，且要共你商量，先用後照，你也須是個人始得，照用同時，你作麼生抵擋？照用不同時，你又作麼生湊泊？」對於「三玄三要」他的頌語是：「三玄三要事難分，得意忘言道易親，一句明明該萬象，重陽九日菊花新。」其大意是三玄三要具體指什麼已無關緊要，關鍵是要從中體會古人意旨，抓住事物的本質，不要從字面上去理解，而是要順着前人指引的這條路當下直入。正如他所云：「言之玄也，言不可及旨之妙也。」與老子的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」極為相似。而這衆妙之門的最高主體就是「心性」。只要心性明瞭，就能當下直入，圓融一切。而能達到這種境界的最直接、最快捷的手段就是參究公案。參到死胡同時，驀地轉身，就能心地發明，打成一片，洞見本來面目。

爲了進一步倡導參究之風，他選擇了不少意義精深或著名的公案進行代別，用他的語來說，就是一些公案「語未盡善者」給予代之，「語不格者」給予別之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將公案作進一步的揭示，或者將公案作修正性的解釋，或者給予延伸，加入自己的思想進一步發揮。如：梁武帝問祖師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祖曰：廓然無聖。帝曰：對朕者是誰？祖曰：不識。代云：弟子智淺。又如《五燈會元·卷六先淨照禪師章》：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：經中道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，若被物轉，即名凡

夫。」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？嚴無對。汾陽代云：「彼此老大！」再如：梁武帝請傳大士講經，大士儼然。帝曰：請大士與朕講經，爲甚麼不講？誌公曰：大士講經畢。代云：講得甚好！朕講經，爲甚麼不講？誌公曰：大士講經畢。代云：講得甚好！

從這些語句來看，都反映了善昭對前人思想的精研和對公案參究的努力。但於公案的代別，卻並非始於善昭，這是必須要區別清楚的。遠在善昭之前，即有許多禪師在這方面着手，如趙州、法眼、歸宗，玄沙、玄覺等，均是這方面的高手，但卻沒有像善昭這樣系統整理和將它作爲一種啓示學人的手段。在當時臨濟宗逐步處於青黃不接的時代，善昭的公案代別及這種儒釋相揉的教學手段，無疑使當時的禪門耳目一新，也爲公案代別注進了新的養份，更重要一點是爲臨濟宗建立和確定了一種新宗風。從藝術上來說，作爲一種文體，它不僅被當時的文人學者所欣賞和接納，而且對後世亦震動不小。因爲代別不僅短小精悍，而且寓意深刻，且又風趣雅緻，有的樸雅天真，帶有濃郁的山村野風。有的言簡意駭，古拙而又俏皮，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禪的氣息和淳樸的田園風味，一直到明清時期盛行的批點，以及通過批點而讓古人著作代自己立言，都是代別這種手段的延伸和繼續。所以善昭的公案代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比前人較爲成功的，從其影響和貢獻來說，是不可磨滅的。

善昭的另一個貢獻在於頌古，即是以韵文的形式對公案進行讚譽性的解釋，因爲這種解釋不僅是一種教禪學禪的手段，其韵文本身亦具極高的文學價值和思想價值。這種體裁不僅爲當時的文學創作開闢了一條新路，而且對宋代禪學發展也是一個極大的推動。因爲禪師們的言語和所作所爲本來就很隱晦，深奧難懂，有的又喜用啞語、手勢和各種動作來形容，更使學者捉摸不透，而且隨着公案的發展，有的禪師又喜故作玄虛用以標榜自己的高明，結果將一些本來很顯淺的道理說得雲裏霧裏，再運用一些妙

推理的命題》，就也可以良性循環，而不至於成為悖論了。

然而，形式邏輯作為人類思維根深蒂固之習慣，要扭轉起來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這在佛教看來就要真參實修，破除對事物認識過程中的外向執着，轉外向執着為自內證知。在這方面，禪宗有一則公案向我們提供了最有啟發性、極富典型意義、可供參照操作的案例。

青原惟信禪師上堂：「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及至後來，親見知識，有個入處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。而今得個休歇處，見山只是山，見水只是水。大眾！者（這）三般見解，是同是別？有人縕素得出，許汝親見老僧。」

未參禪前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」，這是一般的認識方式。見山是山，但不知山之所以為山；見水是水，但不知水之所以為水，知其然但不知所以然。這樣的認識流於形式，這也可以說是以形式邏輯為載體的人類思維的一種局限。及至參禪了，「有個入處」，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，則無非是以佛法緣起論觀照山、觀照水，證知所謂山是一緣起，所謂水也是一緣起，其內在自性本空，其自體不是山、不是水。至於參禪之後「得個休歇處」，「見山只是山，見水只是水」，則是以性空返觀緣起，了知山之所以為山，水之所以為水。所謂山只不過是一緣起幻有山，所謂水也只不過是一緣起幻有水，並無自性可執著。不加主觀偏見執著，則山只是山，水只是水，則不致見山是山執以為山而生崇高崇拜之意而意亂，不致見水是水執以為水而生溫柔嚮往之情而情迷。本體勘破，則附著頓消，迷情自滅，得見真實，得見本來面目……「山只是山，水只是水」。

以佛法緣起論觀照體證認知世間事物，才能證知真實的本來面目，才不致在邏輯悖論中惡性循環，神魂顛倒！

(上接第30頁「汾陽善昭與臨濟家風的振興」)

語玄言，反使學者更加迷茫和糊塗，愈來愈陷入悵惘的迷妄之中，最終的結果是導致最老實的禪師也不得不刁鑽古怪，學生亦跟着古怪刁鑽，禪宗的發展走上了一條畸形變態的道路，有鑑於此，善昭果斷地將一些著名公案進行發掘整理，並用淺顯的文字和雋永的韻調將它再顯出來，不僅容易讓人接受，又可供文人把玩，使禪的文化和禪的種子從下層到上層迅速發展開來。加之他選擇的公案又是不拘宗派，唯以「先賢」的言論作典範，力圖融合各家宗風，追求文字雅緻，韵味雋永，道理淺顯，易於明白。例如他頌《俱胝一指》，俱胝和尚自在天龍禪師門下悟道後，凡有學者來參問，唯舉一指，無別提倡。這是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公案，歷代大德均有代別，如長慶代別云：美食不中飽人喫。玄沙代別云：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。善昭頌古云：「天龍一指悟俱胝，當下無私物匪齊，萬五千差寧別說，直教古今勿針錐。」不僅將俱胝的師承說得很清楚，而且也用很淺顯的道理說出了公案的內涵，其目的就是通過這種手段來普告學者，即禪可以通過文字來表述，學者亦可通過文字去悟入。其最終的一個目的，說穿了就是通過多元化去普及禪知識，真可謂用心良苦。他的這種方法一直影響到後世，被很多禪師所運用，加之文體又較優美，所選擇的公案又帶有山野氣息和逍遙風采，被相當多的士大夫及學者所賞析，從而帶來一場革新。在日後的禪宗發展史上有着強大的生命力。這種方法和揉融諸家的禪風，由其法嗣石霜楚圓承接下來，日後楚圓南遷駐錫湖南瀏陽石霜寺，將臨濟宗由北方向南方推展，形成異常鼎盛轟烈的場面，幾乎席捲整個南方。其後又由其徒楊歧方會與黃龍慧南傳開來，演成楊歧、黃龍二大派系，並遠傳日本，奠定了五家七派之勢，譜寫了禪宗發展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。這都與善昭創立的學說理論及教育方法是分不開的，此已屬後話，不再細表。